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〇期 ——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2d)

【文献资料】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宋要武等
【往事追忆】文革中的北京京西宾馆	杨军戈
【研究报告】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胡 平
【各抒己见】毛泽东“造反”毛体制——关于文革“怪圈”的几点省思	陈奎德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献资料】

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 宋要武等 •

◇ 之一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

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令人可悲的是，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竟有一部分人糊里糊涂地作了这一小撮坏蛋的应声

虫！这些同学一出门就当官做老爷，狂妄自大，他们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把湖北广大革命师生放在眼里。他们闭着眼睛，看不到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巨大成绩，一心想包办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在他们阴暗的心目中，武汉漆黑一团，人民群众觉悟太低，只知迷信省委，都是“保皇派”，而“唯我独好”——“看得清”、“敢造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革命家”。我们说，革命家先生们，你们听听武钢的老工人怎么说的吧！他们说：“你们造反不能乱造，只准造资产阶级的反，不准造无产阶级的反，你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反下去，又要换上什么人？！”

这些同学有一个大特点：一下车就哇喇哇喇地乱发议论，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简直是“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东张西望，道听途说，看到一点表面现象就发号施令乱指挥，根本不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听不进半点不同的意见。有一位同学，刚下火车，听了北京同学的一点介绍，就匆匆忙忙赶到省委门前攻击张体学同志。可怜的是，他说：“张体学作为省长，把长沙运动搞糟了。”原来这位老爷把武汉当作了长沙，连张体学是哪省省长也搞不清，就这样乱发议论，岂不太可笑，太可悲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学们，快点醒悟过来吧，不要再被人当枪使了！你们来了，首先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作调查，听意见，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师生，反而为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开辟讲坛，替他们讲话，攻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湖北省委，攻击坚定的革命左派师生，你们不感到耻辱吗？像武大革委会的革命左派，同“三家村”黑帮一直斗争了六年，始终坚强不屈，终于揪出了这伙黑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斗争。以前，李达黑帮们打击他们，省委支持他们，可现在你们却高喊：打倒武大革委会！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罢掉张体学的官！你们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上，为谁说话，充当谁的辩护士？你们究竟是革谁的命，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那一小撮混蛋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你们竟为他们辩护说：“没听见北京同学说过这些话，这些是武汉同学说的。”那一小撮坏蛋让你们静坐绝食，他们自己却溜出去大吃大喝，可你们还跟着那些坏蛋大骂百般照顾你们的省委和武汉革命群众。更可恨的是，那一小撮混账王八蛋让反革命分子易奕跳上讲台恶毒攻击辱骂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你们还替这一小撮坏蛋辩护，攻击抓住夺走反革命分子易奕手中讲稿的武大革命同学。请问，你们究竟对谁亲，对谁恨？你们反对的是谁，又维护的是谁？难道你们做了这么多坏事，还不痛心吗？那一小撮坏蛋正是在利用你们，打着南下“串连”的旗子，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发动猖狂的进攻。我们要向你们大喝一声：赶快觉悟过来！别再跟着他们跑了！！

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敌人的反党手段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狡猾了。你们这种粗枝大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难道不正好被那些政治扒手、阶级敌人所利用吗？事实证明，你们已被反革命分子当枪使了！

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指示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下车伊始的同志们，放下你们的臭架子，不要再受坏人利用，受坏人蒙蔽了，迈开你们的双脚，到武汉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到革命的师生员工中去做调查研究吧！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我们严正警告那一小撮混进南下串连队伍中的混蛋、王八蛋们，你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把屁放了，想跑了，别他妈的妄想！你们在北

京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来捣乱，在武汉站不住脚，又想跑到北京去拉人来，这更是痴心妄想！我们知道，你们这群混蛋有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地方宗派主义：他们见了北京人就拉。我们刚到武汉，两个北师大的学生就积极地找我们联系，“介绍”情况，还一个劲地要我们搬去和他们一起住，说什么“我们特别需要中学的小将，你们要把北京的造反劲带来。”他们既不知我们的观点，又不让我们调查研究，就以同是北京来的关系笼络人心，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就这样跟着他们跑了。北京同学到外地应该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介绍北京的经验，学习外地的经验，而不是用包办代替的方法替人家搞革命。这伙混蛋妄想以北京的名义把人都拴在他们的周围，跟他们糊里糊涂地造反，这真是痴心妄想，可笑不自量。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可我们就是来造你们的反的，拆你们的台的！告诉你们，革命是不分地区，不分南北的。天下无产阶级是一家！革命的团结起来，不革命的滚开！我们呼吁北京的革命师生，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别让这一小撮混蛋的阴谋得逞！混蛋王八蛋们听着：武汉的革命群众饶不了你们！北京的革命群众饶不了你们！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饶不了你们!!!

通过在武汉这几天的调查研究，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湖北省委领导强得很，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尤其是武汉大学非常非常的好！因此，我们向敬爱的党中央，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建议：在全国树起湖北省武汉大学这面红旗，让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之二

现在有人说：“湖北省武汉大学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里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这真他妈的地地道道的谬论。我们要大声说湖北省武汉大学的运动好得很！

武大是湖北省委树起的一面旗帜，通过武大是能看清湖北省委的。几年来在省委以王任重同志为首的大力支持下，在武大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的问题上，武大的革命左派就和“三家村”黑帮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武大的革命左派坚决要贯彻执行毛主席五八年视察武大时指出的半工半读的方向，这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方向，这是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而以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为首的“三家村”黑帮则要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妄想通过搞垮武大数学系函数论党支部和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把武大革命左派一网打尽，在武大实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函数论党支部和半工半读试验班是整不垮、打不散的。他们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工人同志一起劳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上以自学为主，不做书本的奴隶。他们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政治教科书，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这对“三家村”黑帮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黑帮们不甘心失败，在六五年二月一六月，对武大革命左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他们妄图把武大革命左派诬陷为“反党集团”，并且卑鄙地企图通过考试来考垮数学系试验班。然而，这对有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无畏精神的革命左派来说，是丝毫没有可怕的！武大革命左派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湖北省委的有力支持下，坚决顶住逆流，彻底粉碎了“三家村”黑帮的猖狂进攻。他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了自己，发展了自己，扩大了阵地，锻炼出一批以崔建瑞、李国平等同志为首的坚定的革命左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揪出了以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为首的“三家村”黑帮。从珞珈山到武钢，从武钢到浮桥河（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先在武钢，后又到麻城浮桥河），武大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在斗争中茁壮地成长起来了。现在它正沿着毛主席指示的“学

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教育道路迅跑！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口口声声高喊要打倒湖北省委、打倒武大革委会的先生、老爷们，如果省委是黑帮，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教育体系的萌芽——武大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那样大力支持？又为什么早在六一年就积极支持武大的革命师生与珞珈山“三家村”黑帮作坚决的斗争？现在那些政治扒手公然狂妄地叫喊武大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是假红旗，斗李达黑帮是斗死老虎。这完全是放屁！照你们这样的逻辑，北大在六四年社教运动中就发现了陆平等的问题，聂元梓等革命左派就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那么北大斗陆平黑帮也是斗死老虎？！你们这样说，是对武大革命左派多年来与黑帮作坚决斗争的恶毒诬蔑，是在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妄想为“三家村”黑帮复辟翻案！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的！

武大批判斗争“三家村”黑帮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各地学习的。武大斗争黑帮的过程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的具体体现。他们用文斗，坚决不武斗，实行揭发控诉、批判斗争相结合，大搞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他们控诉旧社会的苦，控诉“三家村”黑帮的毒害，激发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带着问题学毛选，活学活用，调动阶级感情，增强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这样既充分地暴露了牛鬼蛇神的丑恶面目，真正把黑帮彻底斗垮斗倒斗臭，又能触及到自己的灵魂，提高觉悟，受到深刻、具体的阶级教育。同学们通过自己被害以致走上和平演变道路的揭发，就更加激起了大家对阶级敌人的无比愤恨，从而肃清反动毒素，真正达到打倒敌人，提高自己的目的。不光武大，整个湖北省对“用文斗，不用武斗”这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政策都掌握得很好。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省委是黑帮、黑线，还能这样爱护党的生命、敢于坚持党的政策吗？还敢大搞无产阶级教育吗？运动开展得是否轰轰烈烈，不能看表面是否很热闹，是否通夜不睡觉。如果这样的话，轰轰烈烈的标准也未免定得太低了！！我们认为，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是低标准的，是没有思想基础的。只有像武大这样，如“十六条”中所指出的，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把黑帮斗倒、斗臭、斗垮了，并且在斗黑帮的同时，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传播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才是真正轰轰烈烈、扎扎实实、高标准的。只有有了这样的基础，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才是过得硬的，响当当的。否则就是华而不实。如果把你们所认为的如此的“冷冷清清”也当作攻击省委的一条理由，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另外，湖北省的工农业一向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武钢的老工人说：“省委跟毛主席一向跟得紧。”这是对湖北省委最高、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我们还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武汉大学是湖北省的一面旗帜，因此，通过武大是可以肯定省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湖北省各地区、各学校的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总有先进、中间、落后的区别，可是要看一个省委是不是革命，绝不能揪住一些枝节问题大做文章，要看主流，看大方向。我们否认在大好形势下还有阴暗面，我们就是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克服阴暗面，而绝不允许抓住阴暗面大肆地污蔑和否定我们革命的领导、革命的同志，否定我们的主流。如果这样做，就是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最后，我们祝湖北省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祝武大及湖北省的一切革命师生紧紧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紧紧跟着湖北省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

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1966年9月6日

~~~~~

## 【往事追忆】

### 文革中的北京京西宾馆

• 杨军戈 •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卧室后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

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许世友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由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得冲击，不得进去抓人，不得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得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挣脱。在门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

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j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推过来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时候冲击最好，走什路线，用什方式进入室内，用什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

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被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他把押到一个角落，强迫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

【研究报告】

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 胡 平 •

一、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化革命是一场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因此，如何理解这种广泛的群众参与，就成为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文革中的群众参与给出解释。在我看来，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

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这当然不是说，在文革中，群众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只是说，各种不同的思想行为大致都可归之于一个相同的心理动机。由于人们的处境不同，性格不同，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以及诸如此类，因此他们的思想行为会表现出颇大的差异；但是，那并不妨碍他们在心理动机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二、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

众所周知，当年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

在人类生活中，政治本来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按照阿伦特的观点，仅有政治活动才能赋予生命的意义。人类最精华的本质在于追求不朽；而达成不朽的唯一方式，便是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同类中安身立命，因为唯有与他对等的人方能判断其行为，同时也唯有借助于同类的在场见证，才可能使他的行动进入共同记忆即历史之中，并维持不朽。福山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认为，人不仅有满足肉体欲望的需要，而且还有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被承认为一个具有某种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为了赢得这种承认，他甚至乐于冒着风险，克服其动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标。这就是政治的意义之所在。

在当年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革命。别佳耶夫指出，在俄国，革命并非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冲突，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中国的情况更加如此。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起码是在理论上，大家都承认，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认作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

在一个高度革命化的、由所谓革命者掌控了全部资源的社会，革命和个人物质利益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本来，革命是贬低个人物质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革命具有克制个人物质欲望的斯巴达式的外貌。因此，革命具有吸引理想主义者的强大魅力。但与此同时，既然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既然革命被确立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因此这种社会又不可避免地会依据人们的革命程度而安排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它势必要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给予奖赏和惩罚；因此，革命又常常是（虽不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必定是受剥夺的，是吃亏倒霉的。这就迫使那些本来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不做出要革命的样子。于是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诚或多不真诚，你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仅被大家视为唯一的价值，事实上它也的确是的唯一的价值。因为其它活动一概遭到否认、压抑，或者是被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而又大体平均的范围之内。譬如说，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赚大钱是多么光荣的事，事实上你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周围也没有谁比别人有太多的钱。一般人（这里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大都过得去，还不至于为了糊口而必须终日劳碌无暇它顾。换言之，人的物质欲望既有基本的满足，故而缺少迫切的冲动，再加上没有明显的诱惑和没有独立追求的机会；这就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民众将其精力投入政治，投入所谓革命。

三、没有对手的革命

和以往历史上的各种革命都不同，文化革命——如果你硬要称它是革命的话——是一场没有真正的对手的革命。由于十七年的极权统治，大多数人的思想心态均被铸入同一种模式，大

家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论，服从的是同一个最高权威（甚至连文革的被打倒者也常常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尽管人们对同一套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各自心目中的领袖形象也远非一致；但只要大多数人还都认同一个权威，整个运动就必定还处于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任何真正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观点和行动就必将遭到有效的压制。因此之故，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在没有公开的外部竞争者的情况下，文革势必成为一场内部的竞争。

文革既然是一场内部的竞争。因此，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说，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们不能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最关心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诚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言：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员发现能赖以取胜的那些，而人们隐约感到，那些最可能使自己获得胜利的手段和那些最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办法常常不是一回事。

文革的情况便是如此。在文革中，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采取那种观点更容易证明自己革命，更容易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或者是更不容易被他人误会为不革命以至反革命。一个人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这是一回事；一个人去做一种他认为最能招致他人好评的事情，这很可能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把问心无愧作为最高标准，他会采取某种做法；一个人把赢得他人承认（或避免他人否认）作为最高标准，他常常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知道，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态是宁“左”勿右。一事当前，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左上几分的立场。这既是求胜的策略——左对了，证明你比别人更革命；这也是自保的策略——左错了，那也算认识问题，你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多数人都宁“左”勿右，互相作用的结果，又怎么不导致越来越左的结局呢？本来，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内部，在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内部，都存在着这种宁“左”勿右、越来越左的天然趋势；只不过在多元社会中，由于其它派别、其它运动的对抗和牵制，防止了这种趋势走向极端。整个社会有可能在各种对立的力量的相互制约中获得某种平衡；一旦社会本身是高度一元化的，那么，这种激进化趋势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照理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清楚的自觉。

四、文革——表演革命的舞台

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沉闷和压抑；而且，越是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越是那些处境优越因而自命不凡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骚动。这场骚动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如说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年青人对

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学生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不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最高当局，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更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最高当局为原则为光荣呢。

多年以来，共产党不断地向民众灌输它那套意识形态，灌输它精心编织的革命历史神话。这使得许多人（特别是许多青少年）对革命抱着一种高度浪漫化的憧憬，对革命的暴力行为怀有极大的欣赏和崇敬，对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英雄充满效仿之心。因此，只要现实生活提供了某种理由或借口，许多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角色，以种种夸张的姿态显示他们的革命精神；而那种普遍的夸张表演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煞有介事的气氛，以致于使得这些人把表演变得和真实难解难分。如果我们把这些狂热份子称作真正的信徒（True Believer），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过于装腔作势；然而，我们也很难把这一切仅仅称为表演，因为它们的的确确造成了可怕的现实。

五、对若干现象的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文革中群众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了。不妨举几个例子。

1. 关于造反

和现今流行的解释不同，文革中的造反首先还不是对压迫的反抗。因为最早的造反者大都是红五类出身，党团员，积极份子，既得利益者，不错，造反是指对那些仍然享有正统地位的当权派发动攻击；可是，这种攻击决不意味着反抗正统。恰恰相反，造反者是站在更正统的立场，批判对方的背离正统。因此，只有那些原先就具有正统的身份，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承认具有更大信心的人，才会率先打出造反的旗号，照理说，这种人既然是原体制下的受益者，因而似乎没有造反的动机；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人比别人更早地领悟出文革的意义，他们正要通过造反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尽管说到后来，造反派队伍吸收了不少原体制的受害者，少数造反派人士还萌生了若干异端思想，不过这两类人始终未能构成造反派的主流或核心。

2. 选择与被选择

许多原体制下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投入了造反阵营，那与其说是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被选择的结果、在运动初期，他们被强行排除在“革命”潮流之外，想“革命”而不可得；尔后，那个“革命”被宣布为“保守”，宣布为反动路线，于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造反派。当然，他们之中的一部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歧视，反对压迫，这种反抗无疑是合理的。应当说这一部份人是比较自觉地选择了抵制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只是就整体而言，那些政治地位低下者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乃是文革那段特殊进程的产物，文革中最不寻常的一段插曲就是，以刘邓为首的党的各级领导人，依循阶级斗争的惯例，排斥和打击那些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以及敢于向上级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不管这种批评多温和或者是比正统还正统）的人；而毛泽东却站在了刘邓的对立面。毛的做法并非“史无前例”。古代希腊的僭主就常常以下层民众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带领民众打倒旧体制和旧的统治者，建立起更彻底的个人专政。如此说来，下层民众起初把毛视为他们的解放者，后来又视为秦始皇式的最大暴君，那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3. 从右派到左派

人们不难发现，文革中的某些左派，骨子里其实是右派。也就是说，文革中造反派的某些（不是全部）成员，倘就其先前的思想倾向而言，实际上和五七年的一大批右派份子更为类似。这种人大都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下揭竿而起、投身造反运动的。如果你认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动路线是打“人权牌”，那么，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人投身其间自是不难理解，但事情显然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所谓批判反动路线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这就怪了：为什么那些原来就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人，倒会反过来对他们先前还暗中欣赏的人和事发动攻击呢？看来，那也应归因于比赛革命的心理。

不错，这种人思想“右倾”，故而在文革前不被组织信任，且常常受到批评；但在明确的意识层面上，他们自以为还是认同革命，认同领袖，认同正统观念的。正因为他们痛感自己的革命性不被充分承认，所以他们把文革视为表现自己革命性、证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机会，因此积极投入文革。在反动路线猖獗之时，他们多半受到排斥，甚至遭到迫害。可是，由于他们在主观上仍认同革命，因此，迫害并未直接导致反叛意识；相反，它倒强化了他们的忠诚意愿（吃不着的葡萄格外甜）。尔后，毛号召批判反动路线，他们大喜过望。他们既把毛视为自己人；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自己进一步视为毛的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于是，他们就更加积极地为毛的路线而战。作为过去受冷遇被排拒的一批，如今，他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右倾情绪——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他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4. 关于群众性暴力迫害

文革中，群众性的暴力迫害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论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暴力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权），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相反，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施暴者呢？尤其是，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常常要违心地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反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行为往往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只是苦于师出无名。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无怪乎率先出手者总是某些根特红苗特正的人了。

更普遍的一个原因是，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激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激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它是理性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心本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5. 关于“失控”

文革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空前的强大，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又空前的无能。譬如说，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下面的群众似乎都充耳不闻，阳奉阴违。这与其说反映了群众或群众组织的某种反叛性，不如说反映了这种群众运动的自身逻辑，反映了权力本身的二重性。权力的本性是禁止。换句话说，权力只可能对它要去禁止的事情有效力，但对于它不去禁止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效力。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地位相当于一个终审裁决者，他说什么是革命的，什么就是革命的；他说什么是反动的，什么就是反动的。当毛宣布某事是反动的时候，他的权力可谓锐不可当，因为紧接着就会是强大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对于毛承认其为革命派的那些人而言，毛的威力就相当有限了。群众组织在思想上接受毛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并不受毛的直接控制，其内部又无严格的纪律约束。除非大家自觉执行毛的指示，否则，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能够迫使他们不得不执行。不错，大多数人在主观上都是承认毛的无上权威的，可是，在这种群众运动中，大多数参与者最关心的是自己在竞争中胜过他人，因此，他们往往不会按照毛的指示去做，而是按照最可能使自己获胜的做法去做。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在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中，故意做出种种“过火”“过激”的行动分明是有利于自己获胜的，而一丝不苟地执行毛的指示反而会陷于被动。在毛这一方面，既然你承认他们是革命派，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正确，这就意味着你对他们做出的“过火”行动会采取一种理解和原谅的态度。那自然只会助长种种“过火”行为变本加厉，屡劝不止。起初，毛“放手发动群众”，其目的很可能是假借群众的自发行动之力，狠狠地打击他的政敌，同时又乐得以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为名推卸掉自己的责任。但这种手段一经实行开来，毛也就使得自己对群众中的那些自发性的“过火”行动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得于此者必失于彼。

毛对群众或群众组织的“失控”并不是后来才发生之事。例如，老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毛泽东关于要团结大多数的指示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正想用排斥大多数的办法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大体上说，毛泽东越是支持某一派群众，那一派群众倒越可能对那些试图对其行为有所约束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这毫不奇怪，你给予的信任越多，你能施加的约束就越少。被支持的群众一方则有恃宠而骄，有恃无恐的心理，用当时的话讲就叫“自我膨胀”。对此，毛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他干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动，打成保守，然后强力压制。天之骄子的老红卫兵就是这样从“小太阳”变成阶下囚的。要么，他搬出另一支更具正统性的力量（解放军、工宣队）用以控制那些群众组织。最后，毛泽东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结束了群众运动，重新回到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控制。

6. 关于造反派的内战

导致造反派之间长期内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造反派的分裂实属难免。文革既是比赛革命的革命，老的竞争者（保守派）退出后，新的竞争者必然出现。造反派内部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当初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保守派，其内部矛盾隐而不显。一旦老对手被打垮，内部矛盾便尖锐化、公开化。造反派的分裂与其说是矛盾的产物，不如说是竞争的需要。要使竞争继续成为竞争，没有对立面也会制造出对立面，而制造对立面的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的。造反派通常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第三派势力一般都成不了气候。这和许多民主国家两党竞争的格局很类似，第三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而是缺少存在的空间。要竞争，必须有两派；要使竞争保持高度的张力和集中的焦点，只需要两派。

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或争当核心。这种竞争比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竞争更不容易解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时，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这就等于宣判了斗争的胜负结果。可是，面对着两支造反派队伍，中央不可能只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给不了胜负的判决，而造反派们又没有一种公认的决定胜负的竞争程序。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两党竞争是通过选民投票来裁决胜负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却并没有采纳这种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内战势必旷日持久，并且愈演愈烈。再加上普遍的暴力崇拜。当着两派内战发生暴力冲突时，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消除它、防止它。许多人以为武斗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有些人甚至欢迎冲突的恶性发展，因为那使得他们有机会效仿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谱写出一曲血染的青春之歌。本来，赞成武斗的人并不算多；可是一旦武斗发生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其规模便会越来越大。我并不否认造反派的内战也可能揭示出某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但是我相信，这种社会矛盾决没有尖锐到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地步。我也不否认在这场“全面内战”中，当局的纵容、挑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我这里主要是讲群众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把造反派内战归结为争夺权力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尽人皆知，权力只可能属于极少数人。大部份参与者不是追求权力，而只是追求自己这一派的优胜；这样，作为该派中一员，他就能分享到一份胜利者的光荣。事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认为那种荣耀其实毫无价值，可是在当时那种戏剧般的场景下（不妨想一想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它却使很多人感到莫大的激动。

7. 赶下舞台之后

很多当年积极参加文革的青年学生都回忆道，他们是在六八年底、六九年初离开学校，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之后，才开始对文革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刺激这种集体性反思的原因很多。依我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被赶下了舞台，失去了原有的角色。在被下放的最初日子里，有些人还力图保持先前的战斗姿态，他们不时地交流有关运动的最新信息，力图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努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既然他们已经远离了舞台，他们如何还能继续表演？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开始对文革有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他们开始产生了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观点。这其实是很自然的。

8. 关于“峥嵘岁月”的回忆

三年前，一位昔日的红卫兵头头接受记者采访，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于说那段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表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具体的利益，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之怀抱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注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窥视到人们热烈地投入文革的基本动机。假如我们承认，许多群众参加文革，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不如说是通过革命以实现自己，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是那样严重地限制和扭曲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们就对他们在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也许是为我的论点提供的最后一个证据。

六、政治心理学——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以上几段分析，自然还很粗疏；要充实本文的主题，那显然还需要更多的论述。在这里，我只是想提出文革研究的一个值得深入发挥的方面，那就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革参与者的行为。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可我们常常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们自己不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让我们自己信服的解释。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关心这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 原载《北京之春》第三十七期

~~~~~

【各抒己见】

毛泽东“造反”毛体制  
——关于文革“怪圈”的几点省思

• 陈奎德 •

### ◇ 紧绷的体制

一九四九年起，特别是五七年以后，到文革发动，中国政治处于黑暗沉闷时期。

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一整套压抑性的制度，一个“新等级制”的金字塔网络，通过不间断的意识形态灌输，透过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建立起来了。

这一制度，基本上是仿照列宁斯大林式的“党一国”模式而立的。党利用从上到下的蜘蛛网式的组织结构，取代了传统的民间社会，经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空前严密地监控了几亿中国人。这个庞大的网络体制的关键枢纽，就是各地区各单位的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不服从者不得食”，人们“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鉴于此，各单位上下之间的权力关系，带有某种绝对的性质。各级领导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头上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作威作福，颐指气使，享有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势。这样，通过十来年的积累，在底层百姓中特别是各类出身不好的“贱民”中，埋藏了程度不等的对各级领导的怨气，体系蕴含着某种基本的内在紧张。

这就是文革中人们辩论的焦点之一：“十七年体制”。

文革前一、二年，上述气氛更加浓烈。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会，政治迫害业已呈现制度化特征。

文革的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不过是把上述国家恐怖主义赤裸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极之点而已。那是一个极其血腥的时期，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

但是，以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文革与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方向？这是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疑点。

#### ◇ 双面之君——毛泽东

确实，就文革而论，毛的面孔并不是单一的。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毛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它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通观文革全过程中毛的言行，有理由认为，毛的意图的确具有某种复杂性。事实上，旁观者对毛的感受也呈现了复杂性。

王绍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权力斗争不足以解释毛的动机，他认为毛打垮刘少奇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笔者并不以为毛能很轻易搞掉刘，毕竟，毛的公开的崇高地位同党内高层的知情程度及其运作机制是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但是我仍同意，毛的动机绝不仅仅是清除几个政治对手而已。从毛的言行看，无论是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对自己的智力和德行，毛的自我期许是极高极高的。

毛在晚年曾批评中共大官僚们：“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类似的话，毛还讲过多次。

联系到毛的文革举措，它的容易预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振荡后果，可以合理地假定，发动文革的动机，除了权力斗争的逻辑对毛的要求外，毛还欲给自己增加道义上的分量。就是说，在翦除其政治对手这一现实的目标之外，他还欲赋予自己以崇高的道义形象。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既要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要作为受该体系压制的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极权主义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角色。而毛确实是以这种“首创者”的角色自命的。毛的这种近乎疯狂的自我期许，如果不联系到他的巨大辉煌的事功，是不可能理解的。毛以一个农家子而横扫天下，取得神器，其前半生的惊人成功使其飘飘然，无限地膨胀了他的自我估价。他所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其“无所不能”心理的写照。而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人”的幻觉目标在这种心态下是顺理成章的。我以为，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诞行为的钥匙。

如此，诞生了一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然而这一最高权威并非上帝，他有自身的利益和七情六欲，无法抗拒插手人间事务并裁决是非的诱惑。因此，难免随势迁移，变幻无常。鉴于此，文革式“反权威”者们的命运并非自身所能决定，而是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的，即“政治牺牲品”的宿命角色。而就毛氏“反权威”而言，它内含先天的逻辑悖论：即，一个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起而号召反对该体制。由于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

到底。

让我们极其简单地扫描一下毛在文革中起伏不定的基本行止。

从一开始起，在他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明显地要全面摧毁原十七年的官僚体制的同时，他又预留一手，把军队排除在运动之外，亲自制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造反，精心地欲维持原十七年体制的最主要支柱——军队。

从他在六六年怒斥刘邓工作组“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声称“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到后来的六八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使群众运动嘎然而止，并于之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类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恐怖时代重新降临。（事实上，六八年八月之后，毛已在致力于恢复体制，而这期间被纳入新体制的极少数作点缀的“造反派”，如王洪文等，已完全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的“官”，成为新体制的主流。因此，这之后中共上层左翼和右翼之争，与反资反路线时造反派与当权派的斗争的性质已完全不同。）

从他极为借重并与各地造反派红卫兵和中央文革笔杆子王关戚等联手反官僚，到后来，又把王关戚们打入冷宫并把“小将们”放逐农村。

从他怒斥陈毅、谭震林等老军头们为维护原体制而发起的“二月逆流”，到后来不得不亲赴陈毅的灵堂吊唁哭丧，把“二月逆流”的老将们再次扶上高位。

从他把林彪抬到吓人的高度并写进宪法，到后来为安抚老军头和高干而戏剧性地搞垮林彪。

从他打倒原体制的重镇刘邓，后来又重新起用邓小平；然而，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又再次批邓并罢黜邓小平。

.....

所有毛的这些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都源于那种“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号召反对该体制”所固有的非自然性、矫伪性和不彻底性。

上述根本矛盾也就是毛被他自身点起的一把火弄得左右支拙，在文革中起起伏伏，艰难地玩弄平衡的内在原因。

其实，毛那个自命不凡的头脑恐怕一直就没有想清楚的是，他批判大官们享有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特权，反求诸己，他自己的特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毛自己正是“最大的官”。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曾有过哪怕是丝毫的自我反省，更别说自行放弃这些特权了。而且，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那些“官”们，他本人如何可能当上“最大的官”？没有这个体制，他什么都不是，不过湖南一教员而已。全部问题在于，他既要保有体制所赋予自己的最大利益，又要享有体制的受压者的衷心拥戴。这是在做一道注定无解的习题，从较长期的观点看，“熊掌与鱼，二者不可得兼也”。

就思想内涵而言，毛的那一套简陋的乌托邦，其想象力从未超出“延安精神”、“桃花源”、“井田制”、“五斗米教”乃至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孔子“大同书”的范围，而且漫无系统。但是由于他享有的巨大权力，这一粗糙的理想居然影响了几亿人长达十年的生活，并造成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崩溃。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诚然，毛不是没有自己的创造的。他的创造在于，文革的运作方式在一段时期内使他与列宁创造的党控制社会的运作方式有了重大区别。列宁式主要依赖组织的网络逐层逐层地下达并控制各级社会，毛则是没有中间环节从最高层通过广播报纸文件直接下达基层，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即是说，列宁主要靠组织，毛文革主要靠宣传。列宁方式有很大的强制性，毛方式则有很大的煽动性，并且，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赋予了下层民众以解放感。

但是，文革后期（1968年夏天之后），毛向列宁方式的复归，表明他的新方式无法长期操纵控制社会，无法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新秩序。离开过去长期培植起来的得心应手的党组织网络，他无法稳定新体制和新秩序。最后，不得不向他过去建立的旧秩序投降。

他的被看做是临终遗言的话谈到其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一是打赢内战建立中共政权，二是发动文革。前者是确立体制，后者某种意义上正是搞垮该体制。他认为前者受到（党内）拥护，后者则（党内）拥护者甚少。这表明，他耿耿于怀一直萦绕和困惑其晚年心灵的，正是这两项相互矛盾的遗产。他无法二者兼顾。文革期间，毛一直在他的这两项遗产中摇摆、平衡，一直到他的去世前，上述难解的心结仍在折磨和困扰他。

毛的一系列操作平衡权术的过程，虽然使他能永远保持最高的地位，而免于被任何一个政治派系所挟持，所取代，但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实质上，这一过程消耗掉了他过去积累起来的庞大的政治资源，磨损并消费掉了左右两翼的忠诚情结，黯淡了他曾经拥有的理想主义神圣光圈，揭开了他及中共所建立的道德价值系统的虚伪性，损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誉，促成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幻灭。上述那些派别由于反反复复的被利用然后又被抛弃，由于毛玩弄权术过于明显，长此以往，甚至引起了双方的共同怨恨。

另外，任何“反权威”的思潮（毛启动的也不例外），本有其自身的寻求其终点的内在动力。一旦把“反体制”的造反狂潮放开闸门，尽管施加了诸多限制甚至残酷的镇压，但潮流仍将流向自己的逻辑终点：最终走向反“最高权威”。

事实上，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其逻辑后果。这正是始作俑者毛的初衷的反面。

从上述几方面看，他的“一身而兼二任”的狂想尝试都悲惨地失败了。

#### ◇ “政治模拟实验室”

文革，对于中共统治集团而言，犹如一列大体沿着斯大林式轨道行驶的列车突然被抛出了轨，产生了存亡继绝的重大危机。这就迫使它重新调整，寻找方向。在此痛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过去（十七年体制）的谬误，同时，也发现了若用极端的毁坏秩序的方式将导致的更大灾难。于是，被迫接受唯一可行的改革方向：开启门户，准备进入过去曾诅咒的世界主流秩序。这恐怕是文革带给中共的基本“遗产”。

然而，作为负面遗产，文革的经历，也给中共统治集团遗留了烙印很深的“文革情结”，即对自发的民众运动的极端敏感、恐惧和仇视。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处理类似情势的种子。邓小平称1989年的学生运动为文革造反的再现，就是其“文革情结”悲剧性的展现。

就文革对整个社会的具体“遗产”而论，已经不少人作了分析，如，解除了中共各级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魔咒；由于因果报应的普遍性所引起的文革式“政治迫害”的无人豁

免，导致废除其基础——阶级斗争为国策的理论；并进而导致淡化身分等级制、平反“贱民”——五类分子；“文件政治”式的“中央人治”取代了文革前的“层层人治”；“法治”和“人权”观念在民间萌生；官方意识形态在青年中破产；一代人的启蒙；……等等。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大体上仍是有效的，兹不赘述。

本文只概略补充较少被人注意的文革作为“政治模拟实验室”的功能。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文革，是作为一次“微型的”“拟真的”政治过程的预演。其中的政治参与者，鉴于“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国门关闭，新闻封锁，长期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实历史的知识，不懂得基本的政治运作常识，因此，开初的政治操作极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图的揣摩者跟随者和宣传机器的应声虫。

但是，据笔者的仔细观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驱使，由于对十七年来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准确直觉，在实际的各组织和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角逐中，在极其险恶的情势下，人们对政治领悟极快，进展神速。无论是在组织、宣传，还是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把一种“模拟政治”变成了“政治实验室”，马基雅维里式的诸种政治技巧在其中自发地出现。他们通过“阳奉阴违”，对毛指示的“各取所需”和“各自解释”，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变成了“真实政治”。很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谋略，开始出现在派别斗争中，逐渐玩起了复杂的政治游戏。

短短几年的政治成长历程，某种意义浓缩了千年政治智慧的发展。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了中国的一代政客，和大量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这样的一批人已经或正在进入中国的各级权力阶梯，他们的文革经验对其政治行为和理念显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参数，对分析中国的未来路向也许是不无助益的。

□ 原载《北京之春》三十八期（1996年8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